

汪成法 一声短叹

海豚文存



海豚出版社

中国出版集团

成法 声短叹



CIPG

中国
国际
出版
集团

海豚
出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声短叹 / 汪成法著. — 北京: 海豚出版社,

2014.5

(海豚文存)

ISBN 978-7-5110-2019-2

I. ①一… II. ①汪…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94629号

总发行人: 俞晓群

总策划: 梁由之

责任编辑: 李忠孝 郝付云 慕君黎

整体设计: 郑在勇 吴光前

出版: 海豚出版社

网址: <http://www.dolphin-books.com.cn>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邮编: 100037

电话: 010-68997480 (销售) 010-68998879 (总编室)

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及各大网络书店

开本: 32开(787毫米×1092毫米)

印张: 5.375

字数: 80千

印数: 1-6000

版次: 2014年8月第1版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110-2019-2

定价: 28.80元

“海豚文存”小引

梁由之

俞晓群兄主政辽宁教育出版社期间，组织出版过“国学丛书”、“书趣文丛”、“新世纪万有文库”等书系，格局宏放，影响深远，创造了中国当代出版史的一段奇迹。沉潜蕴藉数年后，俞兄从沈阳到北京，出掌海豚出版社，重出江湖，不负初衷。短短一年多时间，赓续旧梦的“海豚书馆”六大系列已陆续面世三十余种，包罗万象，蔚为大观。他兀自意犹未尽，于是又有了“海豚文存”。

承俞兄抬爱，邀约我担任“海豚文存”总策划。即将出炉的“文存”是与“书馆”平行的一套书系，各具特色，相辅相成。相对而言，“文存”不作细致的划分，来路比较野，内容比较杂，不那么经院，不那么学术；若较诸新鲜感、冲击力和可读性，则容有一日之长，或将不遑多让。

有趣，有意思，是我衡量一切优秀书籍的两条标准。二者居其一，已属难得。如果兼而有之，即当馨香以祝，实属可遇而不可求。“海豚文存”每年拟出两辑，约十来本，大抵学界及文坛名宿与中生代的作品各占一半。都能做到坐一望二吗？得读者和时间说了算。

爰书数语，以引珠玉。

2011年7月20日

记于深圳天海楼

自序：一声短叹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屈原两千年前之《离骚》也。

伤心秦汉，生民涂炭，读书人一声长叹。张可久七百年前之《怀古》也。

而其所以太息掩涕长叹者，是以为世事不当如此，民生不当多艰，生民不当涂炭，因思有所奋发而改良之也。

然而两千年的历史明白告诉我们：生民步步涂炭，民生处处多艰，世事岁岁如此。“以为不该发生无非是书生之见，而终于发生乃是严峻的生活和真实的历史。”

（谷林《有为者，亦若是》，《读书》1984年第8期）既然社会难免悲剧，人心自有幽暗，虽然尽非生民之所乐见，对此人世的必然也只能视为当然，不仅掩涕伤心近于过情，即太息或者长叹亦属不必。

何况二十世纪中国饱历奇劫巨变，读书人应该也早已练就了处变不惊的功夫。

然轻轻一叹终亦人情所不能免，故曰短叹云尔。

或曰何不直接取于“长吁短叹”，是不知此语真意者也，盖其中长短互文，故短叹亦是长叹耳。

二〇一一年十月廿一日

目 录

- I 自序：一声短叹
- 1 莫信诗人竟平淡
——从俞平伯的几篇集外文谈起
- 11 沈从文、师陀与电影《边城》
- 30 十八年间两面缘
——沈从文与施蛰存最后两次会见时间考辨
- 37 幸存者的责任
——读《血色流年》随感
- 48 何人识得重与轻
——从舒芜和他的周作人研究谈起
- 64 认错与忏悔
- 84 另一种真实
——也谈贾植芳“拒认”舒芜事件
- 109 由杨宪益说到翻译家研究
- 117 文化交流的“拿来”与“送去”
- 124 黄裳散文与“苦茶庵法脉”

147 青灯有味忆当年
——读钟叔河《青灯集》随感

156 当教授成为主编
——我看陈思和主编《上海文学》

莫信诗人竟平淡

——从俞平伯的几篇集外文谈起

全集不全几乎是一种必然。

因为一个写作者，尤其是一个有资格出版全集的写作者，不可能对自己一生中所有的文字都有收存，而其他人更难以做到这一点。退一步说，由于历史和社会等因素的影响，即便是一个作者曾经公开发表过的文字要全部收集起来也有很大的难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已经做了数十年的鲁迅作品的收集，在每一次“全集”出版之后都有新的鲁迅作品被发现。

所以说这是可以理解和难以避免的必然现象。

但这里所要说的《俞平伯全集》的不全却是属于另外一种情况。

1997年11月，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十卷本的《俞平伯

全集》，辑录了“作者七十多年来各类文章著述”（《出版说明》），总字数达459万之多。依然可能出现遗漏是必然的，后来者的辑佚也是必要的。

但我所发现的却是另一种情况——

1949年9月25日出版的《文艺报》创刊号在社论《庆祝中国人民政协》、茅盾的《一致的要求和期望》两文之后，所刊的第三篇文章是俞平伯的《美国发表“白皮书”后记所感》。这篇文章写于1949年9月3日的北平（当时还不叫“北京”），基本上是一篇政治表态性的文字。比如，针对“白皮书”以及艾奇逊致杜鲁门信中寄希望于“民主个人主义者”的说法，俞平伯论道：“拆穿西洋镜，还不是那么一套，无非要在思想文化上招募结合一班‘第五纵队’，而用美帝的经济、军事的大力配合着运用，里应外合，一举而奴化我中华。”又说：“民主个人主义者指谁呢？美帝在这里的用心很险恶的。他想分化我们，离间我们。我们对付他的方法是不去睬他，更进一步的对策，加强团结。这虽是老话，也是实话。”——这可以说是也曾属于，或被认为属于“民主个人主义者”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毛泽东1954年10月

16日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同志《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语)俞平伯(虽然他基本上不算是留学生)对“白皮书”的回应: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其前言为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为“白皮书”写给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一封信,这个“白皮书”的摘要和前言曾经发表于1949年8月19日和28日的《人民日报》,然后就在国内掀起了一股批判“白皮书”的高潮。在中华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当时的《人民日报》还沿用民国纪年)九月五日出版的《人民日报》第二版有这样一篇报导:《北大教职员联名发表宣言/痛斥美帝白皮书》,在宣言后面所列的总共419个签名者中,也有俞平伯的名字。——当然,也可以说这是对毛泽东的《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等一系列文章的呼应。

在历史转折关头,“民主个人主义者”们的选择是一个有意味的历史现象,因而这一篇文字对我们理解和研究俞平伯以及与其相似的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有着极为重要的参考意义。然而,遍检十大卷的《俞平伯全集》,竟然见不到这篇文字的踪迹。

《文艺报》不是“僻书”，编者怎么会遗漏了这篇文章呢？随后查孙玉蓉编《俞平伯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在1949年9月3日赫然记着这篇文章的写作和发表。这一发现令我更加惊奇：孙玉蓉是《俞平伯全集》的编委之一，在《年谱》中有记录的俞平伯文章怎么会在《全集》中失收呢？

《全集》第十卷最后一部分“附录”的孙玉蓉撰《俞平伯年谱（简编）》，对这篇文章也只字不提。当然，可能的解释是：《全集》的编辑出版早于《年谱》，孙玉蓉等编者当时还未发现此文，还没有注意到俞平伯也曾在《文艺报》上发表文章，直到后来撰写《俞平伯年谱》时才发现这一点。比如：俞平伯1950年7月13日所写的《图穷匕见的美帝国主义》一文发表于1950年7月25日出版的《文艺报》第二卷第九期“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特辑)”，《全集》的正文和“附录”中也没有收录和记录，但是《年谱》在1950年7月13日却也有对此文的记录。

但这种推测随即被另一事实所否定。《全集》第十卷第505页的《俞平伯年谱（简编）》在1950年2月25日记有：

“《文艺报》半月刊第一卷第十一期在‘中苏兄弟同盟万岁’总题下，发表了茅盾、周扬、老舍等十三人的笔谈，其中俞平伯谈了《深厚的友谊》一段。”（《年谱》第260页同此）在《文艺报》第一卷的十二期中，俞平伯发表的仅有这里提到的两篇文章，而其中《深厚的友谊》一文仅一百多字，厕身于许多名家的文章之间；《美国发表“白皮书”后记所感》一文却有一页还多的内容，是本期的第三篇文章，况且又在创刊号上，能发现短文的似乎不应该见不到长文。因此这一失收似乎不应该是因为没有发现，《俞平伯全集》的编者很可能是有意舍去了这一篇文章的。——不，应该是三篇：《图穷匕见的美帝国主义》一文固然也没有收录，《深厚的友谊》一文虽然已经记录于“附录”的《俞平伯年谱（简编）》，《全集》正文中却依然不曾收录。

也许，《俞平伯全集》的编者认为这些文字纯粹属于政治表态性质，和俞平伯一贯的文风作风不协调，不应该收入全集，略如胡文辉在《论“全集”不全》（《随笔》2005年第3期）中所说，是“为尊者讳，有意不收”。如果是这样，那就严重误解了俞平伯这个人。

研究《红楼梦》的学者孙玉明曾经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自‘五四运动’至抗日战争结束后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俞平伯对于政治，基本上是采取了消极抵抗的态度，说得直白一点，也就是逃避。但自抗日战争结束后至1954年‘《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爆发前的近十年间，俞平伯却是积极参与并乐此不疲。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那几年间，他简直成了一个学者型的社会活动家。在许许多多重要的政治活动中，我们总能看到俞平伯那异常活跃的身影。”（《红学：1954》，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11月第1版。）至于“俞平伯那异常活跃”的具体情况，在《俞平伯年谱》中有着详细的记载。以1949年1月为例，就有这么一些记录：

2日 中午，至袁翰青寓所，参加九三学社聚餐。

16日 九三学社同人发表宣言，拥护中共提出的和平八项主张，呼吁军队出城。俞平伯是签名者之一。
午后，访许德珩。

19日 访许德珩。

25日 上午，至府学胡同出席北大沙滩区教授联谊

会干事会，会后商议发表宣言，表明对全面和平的意见。

26日 与北平文化界民主人士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许德珩、袁翰青、费青、闻家驷、储安平 etc. 三十二人发表对全面和平的书面意见，一致拥护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于本月14日提出的和平八项主张。

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之后，到2月28日北平市军管会接管北京大学之前，俞平伯的社会活动更加频繁。1949年5月5日，北京大学最高行政机构——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成立，由教授代表十九人和讲师、助教及学生代表各两人组成，俞平伯为委员之一；7月，又当选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会委员；10月，当选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委员。这时的俞平伯，的确也就是一位社会活动家了。

其实，就是在抗战之前，俞平伯也并非如孙玉明所说，完全对政治“采取了消极抵抗的态度”。且不说五四时代的加入新潮社，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俞平伯即在9月30日致信胡适，大谈救国之道：“今日之事，人人皆当毅然

以救国自任，吾辈之业唯笔与舌，真欲荷戈出塞，又岂可得乎！大祸几近眉睫，国人仍如散沙，非一时狂热供人利用，即渐渐冷却终于弛惰，此二者虽表面不同，为危亡之征候则一也。故现今最需要的，为一种健全、切实、缜密、冷静的思想，又非有人平素得大众之信仰者主持而引导之不可，窃以为斯人，即先生也。……先生以为如何？如有意则盼大集同人而熟商之。大锣大鼓，发聋振聩，平虽不敏，愿从诸先生之后。”（《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5月第1版。）12月21日，俞平伯又在文章中愤慨地对时局表示不满：“在所谓知识阶级里，尽些些明哲保身的聪明人，看不大见杀身成仁的苦小子，我竟不知道救国是不是一个问题，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在我们才会成为问题。”（《救国及其成为问题的条件》）1932年3月1日，俞平伯又作有《致国民政府并二中全会快邮代电》，述说“九一八”事变以来“所怀之疑虑数端”，并且声明：“鄙人未隶任何党籍，供职国立学校，以不敢放弃国民之天责，故质直布其诚悃，如何措施，则在位者之责矣。”11月3日，又作《广亡征》，历数国家将亡的各种征兆，批评政府的对外政策并向国人敲响了救亡的警钟。